

## 刘师培

□ 李帆

## 论

## 先秦学术

作为一代学术宗师，刘师培除留下众多精辟的学术专论外，还有一系列总结中国学术发展历程的学术史论著作问世。这些著作涉猎广泛，由先秦及于清代，并各具特色，对今人非常富有启示意义。遗憾的是，迄今少有学者关注于此。

刘师培论述先秦学术的著作主要有《周末学术史序》、《古学出于史官论》、《古学起原论》、《古学出于官守论》、《补古学出于史官论》等。这些著作又可分为两类，一类为论述古代学术起源的著作，所论内容在时间上大抵处于先秦时期（个别论题延伸至秦之后，但无关宏旨），故于此论之；另一类为论述包括儒学在内的先秦诸子学的著作，以《周末学术史序》为代表。实则二者多有重合，古学起源不少谈的是诸子学的起源，只是出于论述上的方便，才分而论之。

关于古学起源，刘师培以具有内在关联的四篇文章《古学起原论》、《古学出于史官论》、《补古学出于史官论》、《古学出于官守论》阐之甚详。

在《古学起原论》中，他指出，古学出于宗教并基于实验。出于宗教是因“民之初生，不明万物运行之理，又有喜疑之天性，见夫人死为鬼，疑鬼有所归，迷信灵魂不死之说，而人鬼之祀兴。及有威德著于一方者，则祀为一境之神，而地祇之祀兴。又推其先祖所自出，以为人本乎祖，万物本乎天，而天神之祀兴。故中国之宗教，不外天神、人鬼、地祇而已，而人鬼为一切宗教所由生。”“而一二雄鸷之君，利用人民之迷信，遂日以神鬼愚其民，使君权几与神权并重，由是以人君为教主，以人臣为司教之官，凡一切学术、政治悉无不

与宗教相关矣。”<sup>①</sup>不仅“古代之学派”如阴阳、术数、方技“悉与宗教相关”，“实用之学亦出于宗教之中”，如天文之学、兵家之学等皆如此。古学基于实验则因“上古之时，用即所学，学即所用，舍实验而外固无所谓致知之学也。”不过，“唐虞以降，学术由实而趋虚，穷理之学遂与实验之学并崇，此学术进化之次第也。”<sup>②</sup>

在《古学出于史官论》中，刘师培发挥了古学源于宗教之精义，进而阐明古学掌于史官之理。既然“人鬼为一切宗教所由生”（《古学起原论》之言），故“古代所信神权，多属人鬼。尊人鬼，故崇先例；崇先例，故奉法仪。载之文字谓之法、谓之书、谓之礼，其事谓之史。职以其法、载之文字而宣之士民者，谓之太史、谓之卿大夫。有官斯有法，故法具于官；有法斯有书，故官守其书。是则史也者，掌一代之学者也。”<sup>③</sup>具体说来，在周代，六艺之学、九流之学、术数方技之学皆出于史，这已论及诸子学之源。如关于九流之学，他说：“《汉书·艺文志》叙列九流，谓道家出于史官。吾谓九流学术皆原于史，匪仅道德一家。儒家出于司徒，然周史《六弢》以及周制周法皆入儒家，则儒家出于史官。阴阳家出于羲和，然羲和苗裔，为司马氏作史于周，则阴阳家出于史官。墨家出于清庙之守，然考之《周官》之制，太史掌祭祀，小史辨昭穆，有事于庙，非史即巫，则墨家出于史官。纵横家出于行人，然会同朝觐，以书协礼事，亦太史之职，则纵横家出于史官。法家出于理官，名家出于礼官，然德刑礼义，史之所记，则法名两家，亦出于史官。杂家出于议官，而孔

甲、盘孟亦与其列；农家出于农稷之官，而安国书册参列其中；小说家出于稗官，而虞初周说杂伺其间，则杂家、农家、小说家，亦莫不出于史官，岂仅道家云乎哉！”<sup>④</sup>在这里，他把诸子出于王官的说法扩大为诸子出于史官。在《补古学出于史官论》中，他又进一步阐释诸子学兴起之由，认为“古代之时，学术掌于史官，亦不能历久无弊，试即其最著者言之：一曰上级有学而下级无学也，……二曰有官学而无私学也。……有此二弊，此西周学术所以无进步也。”这种局面在周末被打破，“周末之时，诸子之学各成一家言。由今观之，殆皆由于周初学术之反动力耳。一曰反抗下民无学也，……二曰反抗私门无学也。……盖言论思想之自由，至战国而极，此不独九流各成其学也，即学术相同者亦多源远流分，如儒分为八、墨流为三是也。”<sup>⑤</sup>

至于《古学出于官守论》一文，虽为补章学诚周代学术掌于官守之说之未备而作，但其旨亦与《古学起原论》、《古学出于史官论》、《补古学出于史官论》类似，可谓一脉相承，这从其《序》中所言即可看出，“吾观上古之时，政治、学术、宗教合于一途，其法咸备于明堂。明堂者，合太庙太学为一地者也，凡教民、宗祀、朝觐、耕籍、举贤、飨射、献俘、议政、望氛、治历、告朔、行政之典皆行于其中，而有周一代之学术即由此而生。儒家之学即教民之遗法也，墨家之学即宗祀之旧典也，名家之学即举贤之遗制也，法家之学亦行政之大纲也，推之纵横家之学出于朝觐，阴阳家之学出于治历、望氛，农家之学出于耕籍，杂家之学出于议政，兵家之学出于习射、献俘，即道家之学亦从此起源。厥后明堂各典掌以专官，及官失其传，私家著作乃各执一术以自鸣，惜章氏未见及此耳。”<sup>⑥</sup>

总之，在刘师培看来，中国古代学术源于宗教并基于实验，至周代则掌于官守，尤掌于史官。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其所提出的诸子出于史官论。从学术史视角观察，将诸子之学出于王官发展为出于史官，在当时是刘师培的独创，具有学术原创意义，而且刘此论是发表在1905年2月的《国粹学报》创刊号上，比之卓有影响的章太炎《诸子学略说》早发表一年半，这亦可见出刘所具的学术创造力。<sup>⑦</sup>另外，视九流诸子同出于史官，儒家亦为其中之一，与其余诸子并无尊卑之别，这体现了一种近代意义上的学术平等观念，在中国思想和学术发展史上，亦具有开风气之先的革命性质。<sup>⑧</sup>

## 二

除论古学起源的著作外，刘师培论述先秦学术史著作中最重要、影响最大的当为《周末学术史序》。

《周末学术史序》是刘师培拟著之《周末学术史》的序目。有周一代，学权操于史官，到周室东迁，私学兴起，遂成周末诸子之学，故该序目实为论次诸子学术之序目。需要指出的是，刘著此序目之时正是国粹派学者倡导“古学复兴”之际，“古学复兴”之目的是通过复兴先秦诸子学以重振中国文化。作为国粹派主将之一，刘师培著此显然有这方面意图，故国粹派另一主将邓实称赞《周末学术史序》为标志“古学渐兴”的力作。<sup>⑨</sup>另外，刘著此书还与当时的子学热有关。胡适曾描述过这种景象，“到了最近世，如孙诒让、章炳麟诸君，竟都用全副精力，发明诸子学。于是从前作经学附属品的诸子学，到此时代，竟成专门学。一般普通学者，崇拜子书，也往往过于儒书。岂但是‘附庸蔚为大国’，简直是‘婢作夫人’了。”<sup>⑩</sup>子学的兴起，既是清代学者将朴学研究方法逐渐运用于子书的结果，也与西学的传播和影响分不开，因人们纷纷发现子书中有能与西学相比附的内容，如《墨子》中的某些内容可与西方自然科学、社会科学甚至社会主义学说相比附，这自然引起欲沟通中西学术以救亡的读书人的浓厚兴趣。《周末学术史序》即反映了这一潮流。

《周末学术史序》有两个突出特点，一是不采“以人为主”的学案体，而是作“以学为主”的学术史。这是因“近世巨儒稍稍治诸子书，大抵甄明诂故，掇拾丛残，乃诸子之考证学，而非诸子之义理学也。”既不满意于此，就得加以变通，故“采集诸家之言，依类排列，较前儒学案之例，稍有别矣（学案之体，以人为主；兹书之体，拟以学为主，义主分析）。”<sup>⑪</sup>从“以人为主”到“以学为主”，表面上仅是学术史撰著体裁的变迁，实则意义重大，表明中国学术史的研究已开始走上一条新路，即走出旧学术史的樊篱而向建立新学术史的“范式”迈进。如果突破学术史的狭隘视界来看，甚至可以说是中国学术从旧到新的转折点。正如傅斯年所指出的，“中国学术，以学为单位者至少，以人为单位者转多，前者谓之科学，后者谓之家学；家学者，所以学人，非所以学学也。历来号称学派者，无虑数百，其名其实，皆以人为基本，绝少以学科之分别，而分宗派者。纵有以学科不同，而立宗派，犹是以人为本，以学隶之，未尝以学为本，以人隶之。……无论何种学派，数传之后，必至黯然寡色，枯槁以死；诚以人为单位之学术，人存学举，人亡学息，万不能孳衍发展，求其进步。学术所以能致其深微者，端在分疆之清；分疆严明，然后造诣有独至。西洋近代学术，全以科学为单位，苟中国人本其‘学人’之心以习之，必若桎梏之不相容也。”<sup>⑫</sup>用傅氏所言标准来看，刘师培所倡以学科为主的学术史研究，恰是“以学为本，以人隶之”，倾向“以学为单位”之“科学”，摒弃“以人为单位”之

“家学”，表明中国学术正在摆脱古典形态而向现代形态迈进。

二是以西学为参照系，进行中西学类比。这从其标题即可看得很清楚。全书从《心理学史序》至《文章学史序》共 16 个序目，现将其列出（去掉“史序”二字）：心理学、伦理学、论理学、社会学、宗教学、政法学、计学、兵学、教育学、理科学、哲学、术数学、文字学、工艺学、法律学、文章学，其中论理学即为逻辑学，政法学即为政治学，计学即为财政学，理科学即为自然科学。这些学科涵盖之广，几包容现今所言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各领域。以西方学术体系分类阐述先秦学术，这是刘师培学术史研究的一个创举，具有相当重要的“范式”意义和方法论意义。在具体论述中，刘把道家和阴阳家之说与西方社会学理论相比附，说“盖道德家言由经验而反玄虚，以心体为主观，以万物为逆旅，以本为精，以物为粗，以有积为不足，而与时为迁移，乃社会学之归纳派也。”“阴阳家言执一理以推万事，推显而阐幽，由近而及远，即小以该大，乃社会学之分析派也。”同时他也看到道、阴阳两家的不足，指出“道德家言多舍物而言理，阴阳家言复舍理而信数，此其所以逊西儒也。”<sup>⑨</sup>他还用政治学原理对儒、墨两家予以比较，认为“儒家所言政法，不圆满之政法学也。墨家不重阶级，以众生平等为归，以为生民有欲无主则乱，由里长、乡长、国君以上同于天子。而为天子者又当公好恶，以达下情，复虑天子之不能践其言也，由是倡敬天明鬼之说，以儆惕其心。是墨子者，以君权为有限者也，较之儒家，其说进矣。”<sup>⑩</sup>另外，对法家等诸子各家也均用西学评述之，限于篇幅，不再枚举。

中西学术分属于两种截然不同的知识体系，盲目类比，必有牵强附会之处，且从中西交融的视角看，这样做也难免被讥为肤浅。但从学术史的角度看，这却是一种有益的创新，有助于人们转换立场回过头来看待本国的学术发展历程，所以对这种尝试不能简单否定。对于刘师培而言，他能这样做，也与其受过良好的考据学训练有关，即将中国古典学术按西学标准分类，体现出的是考据学专门化的特征和所具的科学思想。此一时期，受过考据学训练者多矣，但唯有刘师培做到了这一点，这不能不说是他的一大学术贡献。实际上，从当时人对《周末学术史序》的反应，便可看出学界是赞赏他这种努力的。如黎锦熙回忆当年“适睹《国粹学报》……所谓《周末学术史序》也，用是大乐，逐篇手抄”；<sup>⑪</sup>钱

玄同认为“刘君对于学术思想，最能综贯群书，推十合一，故精义极多。……以《周秦学术史序》（“秦”当作“未”）为最精。”<sup>⑫</sup>就是今天看来，《周末学术史序》也不失为“研精覃思”（章太炎语）之作。

#### 注释：

①《左盦外集》卷八，《刘申叔先生遗书》，民国二十五年宁武南氏排印本，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7 年重印，第 1473 页，以下皆用此版本，简称《遗书》。

②③④⑤⑥《左盦外集》卷八，《遗书》第 1476—1477 页、第 1477 页、第 1478 页、第 1480—1482 页、第 1483 页。

⑦有人甚至认为“章太炎在 1906 年发表《诸子学略说》，提出诸子出于王官，……应该是受刘师培的影响。”见方光华：《刘师培评传》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1996 年版，第 211 页。

⑧周予同认为，康有为《孔子改制考》的一个作用是“破坏儒教的王统与道统，夷孔子与先秦诸子并列。”（见周予同：《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》，《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》（增订本），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，第 523 页。）康氏之作是借经学以谈政治，不能以纯学术著作视之，而刘师培《古学出于史官论》则为学术探讨，重在学理阐发，故其虽在康书之后出现，其所倡儒家与诸子并列之说，仍具有学术上的革新意义。

⑨邓实：《古学复兴论》，《国粹学报》第 9 期，1905 年 10 月 18 日。

⑩胡适：《中国哲学史大纲》，东方出版社 1996 年版，第 7 页。

⑪《周末学术史序·总序》，《遗书》第 504 页。

⑫傅斯年：《中国学术思想界之基本误谬》，《新青年》第 4 卷第 4 号，1918 年 4 月 15 日。

⑬《周末学术史序·社会学史序》，《遗书》第 507 页。

⑭《周末学术史序·政法学史序》，《遗书》第 509、510 页。

⑮黎锦熙：《（刘申叔先生遗书序）》，《遗书》第 27 页。

⑯钱玄同：《（刘申叔先生遗书序）》，《遗书》第 29 页。

（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博士后 北京市 100875）

责任编辑：吴祖鲲